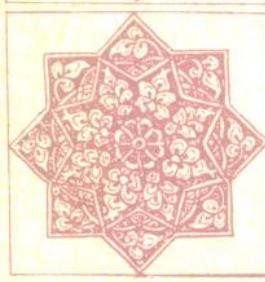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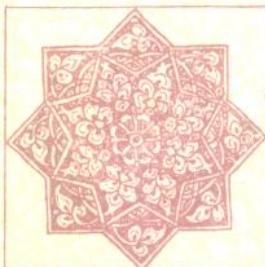


唐 璜



〔英〕拜 伦 著

唐璜

上

〔英〕拜 伦 著

查 良 锋 译
王 佐 良 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唐 璞

下

〔英〕拜 伦 著

查 良 锋 译

王 佐 良 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 新登字 002 号

George Gordon Byron

Don Juan

本诗根据厄恩斯特·柯勒律治编订的
《拜伦诗集》(伦敦1918年出版)译出。

唐 瑛(共两册)

Tanghua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679,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32 $\frac{3}{4}$ 插页5

1980年7月北京第1版 199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9,210

ISBN 7-02-001503-4/I·1330 定价 17.15 元

译本序

拜伦自称《唐璜》是一首讽刺史诗^①。史诗都有一个故事。《唐璜》的故事是很有吸引力的，即使是对拜伦其人不抱好感的读者也往往是一读就难于放下。第一章是一种欧洲讽刺歌剧式的场面：一个天真青年被一个少妇勾引了，惹得她那高龄丈夫带了仆从、打着火把、深夜来搜她的卧房；于是在第二章这个青年不得不航海远行，又出现海上遇险，坐小船漂流，船里人吃人等情节，最后只剩下唐璜一个人游泳到了一个小岛。接着是牧歌似的纯真爱情，两个年轻人在那美丽的小岛上过着几乎是非尘世的幸福生活，然而背景里却有海盗劫掠的刀光剑影，一等海盗头子回到岛上，海黛死去，唐璜被卖为奴。于是又出现了唐璜被人硬当作女奴塞进土耳其苏丹后宫的奇事，等到逃出来又碰上了一场战争。他变成了攻打伊斯迈城的俄国大军里的英雄，从而又有机会去到彼得堡，成为女皇叶卡捷琳娜^②的宠臣，最后又作为她的外交使节被派往英国。……

① 见第十四章第九十九节。

② 拜伦在诗里称之为“喀萨琳”。

然而仅仅举出这些情节却又不足以说明《唐璜》的真正的吸引力。世上情节生动的作品多得很，是什么使得《唐璜》有异于古往今来的惊险故事和爱情小说的呢？它们之间的分别究竟在哪里？

二

首先，在于是什么一类情节，这些情节又被作家赋予什么意义。

唐璜的故事不是从天而降，而是西欧的一个老传说。十七世纪西班牙作家盖布里尔·代叶斯（笔名特佐·德·莫林那）用它作题材编了剧本，以后又在莫里哀的喜剧和莫扎特的歌剧里出现过，直到二十世纪还被肖伯纳写进他的剧本《人与超人》。在这个老传说里，唐璜是一个放荡公子，勾引了西班牙塞维尔驻军司令的女儿，等这位司令上门去质问，又被他一剑刺死，后来司令的鬼魂报仇，终将唐璜拖入地狱。换言之，他是一个无恶不作、毫无心肝的登徒子。然而在拜伦的笔下，这个登徒子却被改造了，成为一个心地善良的热血青年。他由于缺乏人生经验，经不起诱惑，也作了一些蠢事。但是他为人满怀热诚，遇危难先照顾别人，身为奴隶而不屈于土耳其王妃的淫威，接着见义勇为，从一群嗜血的哥萨克兵的刀下救出了一个十岁的小姑娘——这一切都不是一个花花公子的行径！他甚至不是一个所谓“拜伦式英雄”，因为他毫无那种忧郁、厌世、不胜其天人之悲的气息。可见拜伦在创造这样一个唐璜时，不但改造了那个欧洲旧传说，而且还克服了自己早期

的某些弱点，例如为了骇世惊俗而故作姿态。单就这一点说，《唐璜》也标志着拜伦的诗才有了发展，更加成熟了。

实际上，情节本身并不重要——有的作品并无多少情节而不减其伟大，有的作品充满了情节而更显其渺小——重要的是情节后面的思想境界。拜伦写《唐璜》，并不是为了向读者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而是倾注了他的爱与恨的。当他写伊斯迈战役的时候，他不仅歌颂了守土卫国的忠贞和勇敢，也揭发了残忍，写了俄国统帅部里象波爵金亲王那样的人怎样为了自己荣华富贵而不惜屠人之城，造成如山的白骨，从而突出了他对侵略战争的谴责。他又通过无数情节——小到唐璜的假道学的母亲写给儿子的措词绝妙的家信（第十章第三十一至三十三节），大到从第十一章起整整六章所写的英国社会的人物百态——来揭穿虚伪，剥去面具，而面具，一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里所指出的，正是拜伦“所反抗破坏，而迄今犹杀真人而未有止者也。嗟夫，虚伪之毒，有如是哉！”由于拜伦的出身和个人遭遇，他深刻了解英国上层人士的这一贵族遗传病，因而他对于亨利勋爵的写照——“他是个冷淡、善良而正直的人”——就能出之以这些人的假声假气而貌似公允的“文雅”语言，而使他们的真面目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但是更能传神的也许是拜伦对于勋爵夫人的描绘。

她爱她的夫君，至少自觉如此；
但那种爱情是她有意的努力，
好象推石上山，凡是感情逆着
本性而为时，那总是一种苦役。

但夫妇间没有吵嘴或者风波，
她没有什么可以抱怨或挑剔；
他们的结合使大家无不称颂，
又安恬又高贵——只是有些冰冷。

(第十四章第八十六节)

这里有故意的遮掩，又有带着小刺的点明，一句进，一句出，而最后则用“冰冷”二字推翻了前面的一切赞扬，于是英国贵族夫妇之间没有爱情、互相欺骗的家庭生活便赤裸裸地呈现在当时和今天的读者面前了。

这里我们可以附带讨论一个问题：拜伦在写《唐璜》的时候，是否用笔太轻浮？从《唐璜》第一、二章在一八一九年出版之日起，就不断有人指责拜伦“不道德”。事实上，真正触怒保守绅士们的是上面所说的对虚伪面具的揭穿以及下面要提到的对当时政治的激烈言论，不过“不道德”是一条最容易揪住的辫子罢了。拜伦确有轻浮之处，有时还渲染过度，例如近于恶作剧地描绘伊斯迈城的几个土耳其老妇人等待俄军来临的异常心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轻浮的笔调留给轻浮的人和事——对于象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那样淫逸的私生活，怎么能要求拜伦不用轻浮的笔调加以讽刺呢？——但是当拜伦写海黛那样的纯真少女的时候，他的笔下又何尝有半点轻浮！

海黛没有忧虑，并不要求盟誓，
自己也不发誓，因为她没听过
一个钟情的少女会被人欺骗，
或必须有种种诺言才能结合；

她真纯而无知得像一只小鸟，
在飞奔自己的伴侣时只有快乐，
从来不曾梦想到中途变心，
所以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忠贞。

(第二章第一九〇节)

在这里，饱经爱情和婚姻的曲折，失望，沮丧和由之引起的社会的嘲笑、攻击的拜伦是有着无限感喟的，但是同时他也写出了他的理想，他的正面人物；而这里的爱情也不再是无聊的调情和叫人厌恶的勾引，而是这样一种境界：

海黛和唐璜没有想到死的事，
这天地、这大气对他们太适合，
时光也无可挑剔，只嫌它会飞，
他们看自己呢，更是无可指责；
每人就是对方的镜子，谁看谁
都是眼里亮晶晶地闪着欢乐。
他们知道，这宝石一般的闪光
无非是他们眼底深情的反映。

(第四章第十三节)

我们有多么清新之感！同时，我们也要感谢译者，使我们通过他的译文也感受到这清新。

三

有意有意义的情节，深刻而又动人的人物写照，还有欧洲的山

水，欧洲的名城、胜迹、集市、码头和那些地方的芸芸众生，还有那当时当地的气氛——这些构成了《唐璜》的丰富内容，然而这个单子还不完全，因为还缺少一个十分重要的成分，那就是：拜伦的谈吐。论篇幅，与故事无关的拜伦的谈吐几乎占了一半；而且就在故事的开展当中，也是自始至终就夹杂着议论。全诗实际上有两个主角，一个是唐璜，一个是“我”，亦即拜伦。有关唐璜的老传说讲的是遥远以前的事，拜伦把故事拉近到十八世纪之末（伊斯迈之役发生在一七九〇年十一月底），而“我”发议论的时候却是拜伦执笔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这样，诗里有两个时间，所叙述的故事由于有了诗人在三十年后所发的议论而增加了回声，多了一层境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着这故事线索颇为简单的长诗而不感到文章单薄，或过分冗长，反而觉得处处都值得停留、章章都有回味——一句话，这里有无比丰富的内容。

而且拜伦的谈吐又是何等动人的谈吐！它是一个敏感的青年诗人的秉烛夜谈，又是他的自传片断。它表现了多种心情，有时感叹，有时愤怒，有时回忆（如回忆泅渡赫里斯庞特海峡的壮举^①），有时瞻望将来（如预言有一天人会坐飞船登上月球^②）；它是闲扯，诗人无所不谈：人物，地方，历史，哲学，科学，经济，掌故，风俗习惯，更不必说诗中情节所注重的爱情，旅行，战争，更不必说与诗人切身相关的文学（所谈到的作家作品上百，有的论点对后人颇有影响，如第十三章第十一节论塞万提斯怎样用嘲笑笑倒了西班牙的骑士制度，从此西班牙

① 第二章第一〇五节。

② 第十章第二节。

不再产生英雄云云，便影响了后来罗斯金等人对《堂吉诃德》一书的非议），而谈论得最多最经常的则是政治。

从一七九〇到一八二〇年，即上述两个时间之间的那三十年，正是欧洲以及英国政治上极为动荡的时期。法国大革命一爆发，全欧洲鼎沸了，接着是拿破仑纵横欧陆，英国统治阶级纠集了欧洲最反动的势力，好不容易把他打败了，然而国内人民的不满与抗议越来越激烈，于是用血腥镇压来对付，继一八一五年幸胜拿破仑的滑铁卢之役之后出现了一八一九年在曼彻斯特用骑兵冲击群众集会，造成死伤六百人的“庇铁卢”大惨案。

面对这样的政治现实，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诗人怎能无动于衷？怎能袖手旁观？拜伦这时已经移居意大利，然而就在一八二二年十月他动笔写《唐璜》第十一章的时候，虽然已经事隔三年，他还是写进了这一暴行，记下了这笔血债：

我看过了骑马的奴才践踏人民，
好似踢过了一片无言的平沙；

(第十一章第八十五节)

他也早已立下了誓言：

我要和一切与思想作战的人
作战，至少在文字上，(如果可能，
也在行动上。)而在思想的敌人中，
暴君和献媚的奴才一直是最凶。
我不知道谁会胜利，但即使我
有先见之明，也不会使我这种

公然的、坚决的、毫不含糊的憎恨，
对各国的任何暴政稍减一分。

(第九章第二十四节)

在“文字上作战”的证据比比皆是。就在《唐璜》之中，他讥刺英王乔治三世、四世，特别是后者流连声色犬马之好，把自己喂成一个大胖子，“体重二百多磅”^①，拜伦讥讽地说万一将来东方人把他的尸体掘了出来，会“奇怪这样庞大的野兽是怎么吃饭的”^②。他的眼光向来不限于英国，这里他也把他最强烈的憎恨指向欧洲的暴君，特别是那由俄、普、奥三国君主为了扑灭欧洲的民主和解放运动而组成的“神圣同盟”，他把它称为“曾用‘神圣’一词来侮辱世界的最邪恶的同盟”（第六至八章序）。

至于献媚的奴才，他着重打击的是三类：大臣如卡色瑞，武将如惠灵吞，文人如骚塞等“湖畔诗人”。对于卡色瑞这个“心智上的太监”（献辞第十一节），这个早年屠杀爱尔兰人民后来又在欧洲大陆上竭力推行镇压民主政策的“用心最残暴、智力最低劣的大臣”（第六至八章序），拜伦是只要有机会就猛刺一下，连这个奴才在天人交怒、身心交瘁的情况下自杀之后也不饶他。骚塞之类的变节文人则拜伦直呼其名曰：叛徒！（献辞第一节）华兹华斯则着重揭发其被收买前后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③ 对于这类人物，拜伦是毫不容情的。

但是更令英国统治阶级为之愕然的，还得数拜伦对于惠

① 第八章第一二六节。

② 第九章第三十九节。

③ 第三章第九十三节等处。

灵吞的挞伐。由于这位将军侥幸打败了拿破仑，英国和全欧洲的保守、反动势力一齐向他歌功颂德，把他当作最大偶像来崇拜。滑铁卢的炮声刚停，华兹华斯等人就纷纷向他献诗祝贺^①。然而拜伦却在《唐璜》里替他描了这样一幅画像：

你“杰出的刽子手呵，”——但别吃惊，
这是莎翁的话，用得恰如其分，
战争本来就是砍头和割气管，
除非它的事业有正义来批准。
假如你确曾演过仁德的角色，
世人而非世人的主子将会评定；
我倒很想知道谁能从滑铁卢
得到好处，除了你和你的恩主？

我不会恭维，你已饱尝了阿谀，
据说你很爱听，——这倒并不稀奇。
一个毕生从事开炮和冲锋的人，
也许终于对轰隆之声有些厌腻；
既然你爱甜言蜜语多于讽刺，
人们也就奉上一些颠倒的赞誉：
“各族的救星”呀，——其实远未得救，
“欧洲的解放者”呀，——使她更不自由。

(第九章第四、五两节)

① 华兹华斯写了一首十四行诗，题名《滑铁卢之役有感》，发表在1816年的《斗士》杂志上。另一著名诗人司各特也在1815年发表了《滑铁卢战场》一诗，献给惠灵吞之妻。

这一问一答的最后两行是如何一针见血！而争取自由——个人的和民族的自由——正是贯穿《唐璜》全诗的主要精神。

同时，拜伦还有慧眼看出有另一股势力，其强大超过任何国王、谋臣、武士，在操纵着欧洲甚至世界的政治：

是谁掌握世界的枢纽？谁左右
议会，不管它倾向自由或保皇？
是谁把西班牙赤背的爱国者
逼得作乱？使旧欧洲的杂志报章
一致怪叫起来？是谁使新旧世界
或喜或悲的？谁使政客打着油腔？
是拿破仑的英灵吗？不，这该问
犹太人罗斯察尔德，基督徒巴林！

（第十二章第五节）

金融资本家在控制着欧洲！而且，他们的手伸向地球的边缘，
他们的经营、他们的剥削已经带有世界规模了。请看：

大洋的两岸都是他的；从锡兰、
印度或遥远的中国开来的船
无一不为他卸下馨香的产品；
他的葡萄园像朝霞一般红艳；
他的谷子车把道路压得呻吟；
他的地窖可以作国王的宫殿；
但他呢，对感官之欲一概鄙弃，
只克勤克俭——作理智的上帝。

（第十二章第九节）

只消再加上当时正在英国以及欧洲各地出现的曾为另一个诗人布莱克称为“魔鬼的工厂”的近代工业，加上拜伦本人曾在十年前在上议院里发言辩护的砸机器的愤怒群众，这里就是一幅完整的欧洲实况图了。

这样一个不合理的欧洲社会，人民就容忍它永远存在下去吗？拜伦的回答是：

我仿佛听见鸟的歌说，待不很久
人民就会强大；连羸弱的老马
假如被鞍具压得它痛入骨肉，
也不会再往前拉的；而贱民们
终于会厌倦去学约伯的耐心。

（第八章第五十节）

他接着说：人民将拿起石子向这邪恶的巨人身上扔去，一开头似乎只表现了从绝望中迸发出来的勇气，但是只要战斗下去，那么始而弱小，继而相持，最后必然扑杀巨毋霸，一如《旧约》里英雄大卫之所为。因此拜伦的结论是：

唯有革命
才能把地狱的污垢从大地除净。

（第八章第五十一节）

但是他这个贵族了解人民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了解“革命”这一口号的全部含义吗？当时以及后来，不是都有诗人作家，一时也倾心于“革命”，而等革命真正露出它是暴烈的行动的时候，就骇死了甚至叛变了的吗？拜伦可不是骚塞、华兹华斯

之流，他站起来行动的革命人民一边，甚至欢呼这样的巴黎街景：

 法国人还没有学会使用灯光；
 等他们学会了，却又不捻灯芯，
 而是把恶徒吊上柱子来照明。

 沿大街吊起一列高贵的绅士，
 当然能给人类以光明和教化，
 正如把地主的庄宅烧把野火

（第十一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

这里的“把恶徒吊上柱子”并非诗人的文学比喻，而是法国大革命后斗争年月里的严峻现实。那时，巴黎人民还唱着一首战歌，其最后的迭句就是：

 一切都会好，一切都会好，
 贵族吊在路灯上，
 我们要把贵族都上吊！

这样的欧洲现实几曾出现在当时别的诗人笔下？

何况不止笔下！在拜伦写这些诗行的时候，他已经参加了意大利拉瓦那城的烧炭党的革命活动①。更远一点，从一八一三年起，他就已经认为不能再指望通过议会来实行英国的内政改革。那一年，他在日记里写下：“我已拒绝把负债人请愿书向议会提出，因为我厌弃了议会游戏。”（一八一三年十一月

① 见拜伦 1821 年 1 月 13 日日记。

十四日)他又写信告诉朋友：“我得到去议会投票的通知，但我将拒不出席。高谈阔论，又有什么用处，既然‘某些争端应由武力来仲裁’”(一八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致墨莱函)。至于后来，他更是放弃了《唐璜》的写作而参加了希腊志士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并且死在军中，这就已是历史，无须我们多说了。

四

出现在《唐璜》里的就是这样的闲谈。闲谈不仅是《唐璜》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因为有了它，作品对现实的挖掘也大为深入了。

然而以闲谈入诗并不容易。拜伦的另一胜利，在于他为他那夹叙夹议的风格，找到了合适的诗体，即意大利八行体(ottava rima)。

这八行体，经过意大利诗人普尔其、勃尼等人的运用，有一个显著的优点，即能够适应口语风格，在高明的诗人笔下更能做到庄谐并陈，伸缩自如，而同时它又有格律，有脚韵，保持了诗的形式和特色。

拜伦曾用这八行体翻译了普尔其的《巨人摩甘特》第一章，而且用它写了一首嘲弄威尼斯婚姻和爱情风尚的叙事诗《别波》，写得五彩缤纷，妙趣横生，一如诗中作为背景的当地狂欢节——然而在诗人，这不过是牛刀小试，为以后的杰作预作准备罢了。

等到他来写《唐璜》，他已经能够充分驾驭这个八行体，做到运用自如了。他用它来写人，写景，写异域风光：